

宋史卷四百二十七

列傳第一百八十六

道學(一)

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(弟) 戯 邵雍

“道學”之名，古無是也。三代盛時，天子以是道爲政教，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，黨、庠、術、序的老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，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。是故盈覆載之間，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，以遂其性。於斯時也，道學之名，何自而立哉。

文王、周公既沒，孔子有德無位，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，退而與其徒定禮樂，明憲章，刪《詩》，修《春秋》，贊《易象》，討論《墳》、《典》，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。故曰：“夫子賢於堯、舜遠矣。”孔子沒，曾子獨得其傳，傳之子思，以及孟子。孟子沒而無傳。兩漢而下，儒者之論大道，察焉而弗精，語焉而弗詳，異端邪說起而乘之，幾至大壞。

千有餘載，至宋中葉，周敦頤出於春陵，乃得聖賢不傳之學，作《太極圖說》、《通書》，推明陰陽五行之理，命於天而性於人者，瞭若指掌。張載作《西銘》，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，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，灼然而無疑焉。仁宗明道初年，程顥及弟

“道學”這個名稱，古時是沒有這樣稱的。在三代盛世，天子把這個道作為政教，大臣百官有關部門把這個道作為職業，黨、庠、術、序的老師和弟子把這個道作為講習內容，四方百姓每天都運用這個道却不知曉。所以天地之間，沒有一個人和一樣物不蒙被這個道的潤澤，以成全各自的本性。在這個時候，道學的名稱，又從何而起呢？

文王、周公去世之後，孔子有德而無位，既然不能使這個道的功用逐漸蒙被這個時代，於是退而與他的門徒修定禮樂，申明典章制度，刪定《詩經》，修撰《春秋》，贊美《易象》，探討論說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，期望使五帝三代聖人的道永遠昭明。所以說：“夫子比堯、舜賢明，超越遠了。”孔子死後，惟獨曾子得到他的傳授，傳給了子思，這樣傳到孟子。孟子死後，這個道就不傳了。兩漢之後，儒者論說大道，細察却不精要，敘述却不詳盡，異端邪說乘機而起，道學幾乎到了大破壞的地步。

一千多年以後，到了宋代中葉，周敦頤從春陵出現，於是得到了聖賢不傳的學問，著作《太極圖說》、《通書》，推明陰陽五行的道理，那些受命於天而稟性於人的奧秘，瞭若指掌。張載著作《西銘》，又極力闡述理一有區別的意旨，然後道的本源從天而出，灼然而沒有疑義。仁宗明道初年，程顥和他的弟弟程頤出生，等到他們

頤實生，及長，受業周氏，已乃擴大其所聞，表章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二篇，與《語》、《孟》并行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，下至初學入德之門，融會貫通，無復餘蘊。

迄宋南渡，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，其學加親切焉。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，明善誠身爲要，凡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六藝之文，與夫孔、孟之遺言，顛錯於秦火，支離於漢儒，幽沉於魏、晉、六朝者，至是皆煥然而大明，秩然而各得其所。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。其於世代之污隆，氣化之榮悴，有所關係也甚大。道學盛於宋，宋弗究於用，甚至有厲禁焉。後之時君世主，欲復天德王道之治，必來此取法矣。

邵雍高明英悟，程氏實推重之，舊史列之隱逸，未當，今置張載後。張栻之學，亦出程氏，既見朱熹，相與博約又大進焉。其他程、朱門人，考其源委，各以類從，作《道學傳》。

周敦頤

周敦頤字茂叔，道州營道人。元名敦實，避英宗舊諱改焉。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，爲分寧主簿。有獄久不決，敦頤至，一訊立辨。邑人驚曰：“老吏不如也。”部使者薦之，調南安軍司理參軍。有囚法不當死，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。逵，酷悍吏也，衆莫敢爭，敦頤獨與之辨，不聽，乃委手版歸，將棄官去，曰：“如此尚可仕乎！殺人以媚人，吾不爲也。”逵悟，囚得免。

移郴之桂陽令，治績尤著。郡守李初平賢之，語之曰：“吾欲讀書，何如？”敦頤曰：“公老無及矣，請爲

長大之後，跟從周敦頤學習，而後便擴充師說，倡明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兩篇，與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並行於世。於是上自帝王心傳的奧秘，下至初學者進德的門徑，全都融會貫通，不再有剩餘的義蘊。

到了宋南渡之後，新安的朱熹得到程氏正傳，他的學說更加親切實。大體上以格物致知爲前提，以明善誠身爲要領，凡是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六藝的文章，與孔子、孟子的遺言，在秦始皇焚書中顛倒錯亂，被漢儒所歪曲肢解，在魏、晉、六朝幽隱不明的，到這個時候都煥然而大放光明，井然有序而各得其所。這就是宋儒的學問超越諸子而上承孟子的原因所在。這對於時代的污濁興隆，氣運的繁榮憔悴，有很大關係。道學興盛於宋，可宋在運用上不講究，甚至發生嚴加禁止。後來的君王，如果想要恢復天德王道的治理，一定會到道學中取法。

邵雍天資聰明英發善悟，程氏確實推重他，舊有的史傳把他列在隱逸之類，并不恰當，現在列在張載之後。張栻的學問，也出自程氏，見到朱熹之後，互相交流博通而得要旨從而又大有長進。其他的程、朱門徒，考察他們的原委，各以類相從，因而作本書《道學傳》。

周敦頤字茂叔，道州營道人。原來叫敦實，後來因爲避英宗的舊諱而改名。由於舅舅龍圖閣學士鄭向的保舉，任分寧主簿。有件案子久而未決，周敦頤來到後，一經審訊，立刻使案情明瞭。城裏的人都驚奇地說：“老的獄吏都不如他。”部使者推薦他，於是調任南安軍司理參軍。有個囚犯論法不該判死罪，轉運使王逵想重治他。王逵，是個殘酷凶悍的官吏，衆人都不敢與他爭辯，惟有周敦頤與他爭辯，王逵不聽，於是周敦頤丟下手板返回，打算棄官離去，說道：“這樣還可以爲官麼！用殺人來向人獻媚，我不幹這種事！”王逵明白過來，囚犯幸免於死。

改任郴州桂陽縣令，治政業績尤爲顯著。太守李初平認爲他是個賢才，對他說：“我想讀書，該怎麼讀呢？”周敦頤說：“你年紀大了恐怕

公言之。”二年果有得。徙知南昌，南昌人皆曰：“是能辨分寧獄者，吾屬得所訴矣。”富家大姓、黠吏惡少，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，而又以污穢善政爲耻。歷合州判官，事不經手，吏不敢決，雖下之，民不肯從。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，臨之甚威，敦頤處之超然。通判虔州，抃守虔，熟視其所爲，乃大悟，執其手曰：“吾幾失君矣，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。”

熙寧初，知郴州。用抃及呂公著薦，爲廣東轉運判官，提點刑獄，以洗冤澤物爲己任。行部不憚勞苦，雖瘴癘險遠，亦緩視徐按。以疾求知南康軍。因家廬山蓮花峰下，前有溪，合於溢江，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。抃再鎮蜀，將奏用之，未及而卒，年五十七。

黃庭堅稱其“人品甚高，胸懷灑落，如光風霽月。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，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，菲於奉身而燕及營繕，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”。

博學力行，著《太極圖》，明天理之根源，究萬物之終始。其說曰：

無極而太極。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，靜極復動，一動一靜，互爲其根，分陰分陽，兩儀立焉。陽變陰合，而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五氣順布，四時行焉。五行一陰陽也，陰陽一大極也，太極本無極也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無極之真，二五之精，

時間緊迫，請讓我爲你說一說。”學了二年果然有收獲。周敦頤又升爲南昌知縣，南昌的人都說：“這就是能辨明分寧案件的那個人，我們這下可有地方說理了。”富戶人家，名門大姓，狡詐的官吏，爲惡的年輕人，都惴惴不安，不僅擔憂得罪縣令，而且把玷污善政當成耻辱。任合州判官，事情不經他的手，官吏就不敢決斷，雖然發布了命令，老百姓也不肯聽從。部使者趙抃爲讒言所迷惑，對待他非常嚴厲，周敦頤超然處之。通判虔州的時候，趙抃爲虔州太守，仔細觀察他的所作所爲，一下子明白過來，趙抃拉住他的手說：“我險些失去了你，從今以後我真正瞭解了周茂叔。”

熙寧初年，周敦頤爲郴州知州。因爲趙抃和呂公著的推薦，任廣東轉運判官，提點刑獄，以洗清冤獄、惠澤於物爲己任。在部中巡行不辭勞苦，即使是充滿瘴癘之氣的地方，艱險遙遠的地方，也要進行視察。後來，他因病請求改任南康軍知軍。於是在廬山的蓮花峰下安了家，前面有一溪流，與溢江匯合，取在營道時就居的濂溪之名字來命名。趙抃再次鎮守蜀地的時候，打算上奏進用周敦頤，還沒來得及上奏，周敦頤就去世了，終年五十七歲。

黃庭堅稱贊周敦頤：“人品非常高尚，襟懷灑脫磊落，好比光風霽月。淡於求名，銳意求志，不注重求得外在的福祿而注重如何獲得民心，持養自身很菲薄，却注意護養孤寡之人，疏於迎合世俗而崇尚與千古之人爲友。”

學識廣博而身體力行，著有《太極圖》，探明天理的根源，萬物的始終。他說：

自無極而太極。太極運動而產生出陽氣，運動到了極致就變爲靜止，由靜止而產生出陰氣，靜止到了極致又變爲運動，一動一靜，二者互爲本源，陰陽二氣區分開來，二儀就建立了。陽氣變化陰氣參合，於是產生出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五氣順相播布，四時得以運行。五行統一於陰陽之氣，陰陽之氣統一於太極，太極本於無極。五行的產生，都歸一於其各自的本性。

妙合而凝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二氣交感，化生萬物，萬物生生，而變化無窮焉。

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，形既生矣，神發知矣，五性感動而善惡分，萬事出矣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，立人極焉。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時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。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。故曰：“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。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。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”又曰：“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”大哉《易》也，斯其至矣。

又著《通書》四十篇，發明太極之蘊。序者謂“其言約而道大，文質而義精，得孔、孟之本源，大有功於學者也”。

據南安時，程珦通判軍事，視其氣貌非常人，與語，知其爲學知道，因與爲友，使二子顥、頤往受業焉。敦頤每令尋孔、顏樂處，所樂何事，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。故顥之言曰：“自再見周茂叔後，吟風弄月以歸，有‘吾與點也’之意。”侯師聖學於程頤，未悟，訪敦頤，敦頤曰：“吾老矣，說不可不詳。”留對榻夜談，越三日乃還。頤驚異之，曰：“非從周茂叔來耶？”其善開發人類此。

嘉定十三年，賜謚曰元公，淳祐元年，封汝南伯，從祀孔子廟庭。

二子壽、燾，燾官至寶文閣待制。

程顥

程顥字伯淳，世居中山，後從開

無極的真粹，二氣五行的精華，奇妙地參合而凝聚，乾道形成男，坤道形成女。陰陽二氣交相感應，就生成變化出萬物。萬物生生不息，變化沒有窮盡。

惟有人得到天地的秀氣而最爲靈異，形體既已產生，心神就發出智慧，五性感動於心而善惡之情由此分明，萬事由此產生。聖人用中正仁義之道來安定人心而力主靜，確立人們行動的標準。所以聖人與天地參合其道，與日月混合其明，與四時應合其秩序，與鬼神冥合其吉凶。君子以此修養自己而吉祥，小人違背而遭凶險。所以說：“立天之道，是陰和陽。立地之道，是柔和剛。立人之道，是仁和義。”又說：“追源返始歸於極，由此而知道生和死的道理。”《易》真是偉大，這就達到了極致。

又寫了《通書》，共有四十篇，以闡發說明太極的含義。爲之作序的人說“言語簡約而道理深大，行文質樸而義蘊精深，探得孔、孟學說的本源，對於學者大有用處”。

任南安時，程珦爲軍事通判，看他精神容貌不同常人，就跟他相交談，獲知他研治學問，通曉道學，就與他交了朋友，讓兩個兒子程顥、程頤跟他學習。周敦頤常常讓他們尋找孔子、顏淵的快樂所在，使他們知道快樂的是什麼事，二程的學說就於此發源、衍變。所以程顥曾說：“自從再次見到周茂叔後，在吟風弄月中歸返時，就有了‘吾與點也’的心懷。”侯師聖跟程頤學習，沒有明白，就去拜見周敦頤，周敦頤說：“我老了，闡述不能不詳細。”於是將他留下來，與他對床夜談，過了三天纔回去。程頤對他感到驚異，說：“你不是從周茂叔那裏來嗎？”他就是這樣善於啓發開導人。

嘉定十三年，周敦頤賜謚元公，淳祐元年，封爲汝南伯，在孔子廟中陪祭。

他有兩個兒子周壽、周燾，周燾官做到寶文閣待制。

程顥字伯淳，世代住在中山，後來從開封遷

封徙河南。

高祖羽，太宗朝三司使。父珦，仁宗錄舊臣後，以爲黃陂尉。久之，知龔州。時宜僚區希範既誅，鄉人忽傳其神降，言“當爲我南海立祠”，於是迎其神以往，至龔，珦使詰之，曰：“比過潯，潯守以爲妖，投祠具江中，逆流而上，守懼，乃更致禮。”珦使復投之，順流去，其妄乃息。徙知磁州，又徙漢州。嘗宴客開元僧舍，酒方行，人謠言佛光見，觀者相騰踐，不可禁，珦安坐不動，頃之遂定。熙寧法行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，珦獨抗議，指其未便。使者李元瑜怒，即移病歸，旋致仕，累轉太中大夫。元祐五年，卒，年八十五。

珦慈恕而剛斷，平居與幼賤處，唯恐有傷其意，至於犯義理，則不假也。左右使令之人，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。前後五得任子，以均諸父之子孫。嫁遣孤女，必盡其力。所得奉祿，分贍親戚之貧者。伯母寡居，奉養甚至。從女兒既適人而喪其夫，珦迎以歸，教養其子，均於子侄。時官小祿薄，克己爲義，人以爲難。文彥博、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，詔賜帛二百，官給其葬。

顥舉進士，調鄆、上元主簿。鄆民有借兄宅居者，發地得塗錢，兄之子訴曰：“父所藏。”顥問：“幾何年？”曰：“四十年。”“彼借居幾時？”曰：“二十年矣。”遣吏取十千視之，謂訴者曰：“今官所鑄錢，不五六十年即遍天下，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，

徙到河南。

他的高祖程羽，爲太宗朝三司使。父親程珦，在仁宗錄用舊臣後，被任命爲黃陂尉。過了很久，改知龔州。當時宜僚的區希範已經被殺，鄉人忽然傳說他的神魂降臨了，說“要爲我在南海立祠”，於是鄉人迎接他的神位到南海去，來到龔州的時候，程珦派人察問是怎麼回事，回答說：“經過潯州的時候，潯州太守認爲是妖怪，就把祠中東西扔到了江中，却逆流而上，太守害怕了，於是又加以禮遇。”程珦讓人又扔到水中，却順流而去，虛妄於是止息。改知磁州，又改知漢州。他曾經在開元的僧人房舍宴客，正在行酒的時候，有人喧鬧着說佛光出現了，觀看的人互相踏踩，不能禁止，程珦穩坐不動，一會兒就安定了下來。熙寧新法頒行的時候，各地的知州縣令惟恐執行命令落到後邊，祇有程珦力排衆議，指出其不便之處。使臣李元瑜爲此發怒，於是程珦告病而歸，不久退休，多次轉官爲太中大夫。元祐五年去世，卒年八十五。

程珦慈愛寬厚而又剛毅果斷，平時跟孩童僕人相處，惟恐傷害了他們，但是他們侵犯了義理的時候，就絲毫不庇護。對他左右的僕役，每天都要察看他們的飢飽冷暖。前後有五次得到任命自己兒子爲官的機會，都讓給了同族叔伯的子孫。他爲孤女辦婚嫁之事，不遺餘力。得到的俸祿，都用來供給貧窮的親戚。伯母寡居，他奉養得很周到。伯父家的女兒嫁人後丈夫死了，他就將其迎回家中，教育供養她的孩子，一如自己的子侄。當時他的官位很小，俸祿也很薄，可是他却能恪守禮義，當時人都認爲很難得。文彥博、蘇頌等九人上表稱贊他清風亮節，皇帝下詔賞賜二百匹布帛，由官府置辦喪葬之事。

程顥考中進士後，調任鄆、上元二縣主簿。鄆縣有個百姓借自己哥哥的房宅居住，在挖地時發現了埋在地下的銅錢，於是哥哥的兒子上告到程顥那裏，說：“這是我父親藏下的。”程顥問：“藏了多少年了？”回答說：“四十年。”程顥又問：“他借房子居住有多長時間了？”回答說：“二十年了。”程顥於是派遣吏人取來十千錢觀

何也？”其人不能答。茅山有池，產龍如蜥蜴而五色。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，半塗失其一，中使云飛空而逝。民俗嚴奉不懈，顥捕而脯之。

爲晋城令，富人張氏父死，旦有老叟踵門曰：“我，汝父也。”子驚疑莫測，相與詣縣。叟曰：“身爲醫，遠出治疾，而妻生子，貧不能養，以與張。”顥質其驗。取懷中一書進，其所記曰：“某年月日，抱兒與張三翁家。”顥問：“張是時纔四十，安得有翁稱？”叟駭謝。

民稅粟多移近邊，載往則道遠，就糴則價高。顥擇富而可任者，預使貯粟以待，費大省。民以事至縣者，必告以孝弟忠信，入所以事其父兄，出所以事其長上。度鄉村遠近爲伍保，使之力役相助，患難相恤，而奸偽無所容。凡孤榮殘廢者，責之親戚鄉黨，使無失所。行旅出於其途者，疾病皆有所養。鄉必有校，暇時親至，召父老與之語。兒童所讀書，親爲正句讀，教者不善，則爲易置。擇子弟之秀者，聚而教之。鄉民爲社會，爲立科條，旌別善惡，使有勸有耻。在縣三歲，民愛之如父母。

熙寧初，用呂公著薦，爲太子中允、監察御史裏行。神宗素知其名，數召見，每退，必曰：“頻求對，欲常常見卿。”一日，從容咨訪，報正

看，然後對上告的人說：“現在官府所鑄的錢，沒有五六年就遍行天下了，這都是未埋藏前幾十年所鑄的，爲什麼呢？”那個人回答不上來。茅山有個水池，其中出一種好似蜥蜴的五色龍。祥符年間曾經捕捉了兩條拿到京城，半路上丟了一條，朝廷使臣說騰空而逝了。民衆嚴謹供奉不懈怠，程顥捕捉到五色龍而把它們做成了肉乾。

程顥任晋城縣令，有個姓張的富人父親死了，早晨有個老者來到門前說：“我是你的父親。”姓張的富人感到驚異又滿腹疑慮，無法斷定真假，就和那個老者一起來到了縣上。老者說：“我是個醫生，出遠門治病的時候，妻子生了孩子，家貧不能撫養，就送給了張氏。”程顥問他可有什麼憑證。老者從懷中取出一本書交給程顥，祇見書上寫着：“某年某月某日，將兒抱給張三翁家撫養。”程顥問道：“張氏這時祇有四十歲，怎麼會稱爲翁呢？”老者驚駭謝罪。

老百姓交納的稅糧大多要運到邊疆附近，若用車運則愁道路遙遠，如果在當地購買則價錢很高。程顥於是選擇那些富裕而可以信任的人，讓他們預先儲備好糧食等在那裏，這樣費用就節省了許多。老百姓因事來到縣裏，程顥一定要告訴他們孝悌忠信的道理，在家侍奉父兄，出門侍奉尊長。根據鄉村間的遠近成立伍保，使百姓需要出力、服役的時候互相幫助，有患難的時候互相體恤，使奸詐欺僞之人無所容身。凡是孤寡殘疾的人，都責求他們的親戚和鄉里照應，使他們免於流離失所。外地人在途中患上疾病的，都能得到調養。每個鄉都有學校，他在閑暇時親自來到學校，召集鄉中父老談話。鄉里兒童所讀的書，他親自訂正句讀，教員不好，就另外換人。他還選擇優秀的年輕人，將他們集中起來進行教授。百姓舉行村社聚會時，爲他們立公約，甄別善惡，使百姓知道取捨。在這個縣作了三年縣令，百姓就像敬愛自己的父母一樣敬愛他。

熙寧初年，因爲呂公著的推薦，任太子中允、監察御史裏行。神宗素聞其名，幾次召見程顥，每次退朝，神宗都要說：“叫你問對，是因爲我想常見到你。”有一天，程顥從容詢訪，時

午，始趨出，庭中人曰：“御史不知上未食乎？”前後進說甚多，大要以正心窒欲、求賢育材爲言，務以誠意感悟主上。嘗勸帝防未萌之欲，及勿輕天下士，帝俯躬曰：“當爲卿戒之。”

王安石執政，議更法令，中外皆不以爲便，言者攻之甚力。顥被旨赴中堂議事，安石方怒言者，厲色待之。顥徐曰：“天下事非一家私議，願平氣以聽。”安石爲之愧屈。自安石用事，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。居職八九月，數論時政，最後言曰：“智者若禹之行水，行其所無事也；舍而之險阻，不足以言智。自古興治立事，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，況於排斥忠良，沮廢公議，用賤陵貴，以邪干正者乎？正使微倖有小成，而興利之臣日進，尚德之風浸衰，尤非朝廷之福。”遂乞去言職。安石本與之善，及是雖不合，猶敬其忠信，不深怒，但出提點京西刑獄。顥固辭，改簽書鎮寧軍判官。司馬光在長安，上疏求退，稱顥公直，以爲己所不如。

程昉治河，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，衆逃歸。群僚畏昉，欲勿納。顥曰：“彼逃死自歸，弗納必亂。若昉怒，吾自任之。”即親往啓門拊勞，約少休三日復役，衆歡踊而入。具以事上，得不遣。昉後過州，揚言曰：“澶卒之潰，蓋程中允誘之，吾且訴于上。”顥聞之，曰：“彼方憚我，何能爲。”果不敢言。

間已是正午，他纔走出殿門。庭中的人說：“你不知道皇上還沒吃飯嗎？”他前後向神宗進言很多，大抵是要他端正本心、杜絕欲望、訪求賢士、培育英才，力求以誠意來感悟皇上。他曾經勸神宗要注意防止尚未萌發的欲望，以及不要輕慢天下的士人，神宗聽後俯身說：“我要爲你而警惕。”

王安石執政後，商議更改法令，朝廷內外都認爲不便，言官攻擊很猛烈。程顥被召赴朝中議事，這時王安石正對言官發怒，對他厲色相待。程顥不慌不忙地說：“天下之事不是由一人議定的，希望你能平心靜氣地傾聽。”安石於是感到慚愧。自從安石執掌政事，程顥未曾有一句話言及功利。他居言官八九個月，幾度論說時政，最後他說：“智者行事就像禹疏導水流，使水奔流在沒有阻礙的地方；如果捨此不爲而使水行經險阻之地，就稱不上是智者。自古以來興治立事，沒有朝廷上下的人都說不行而能够成功的，更何況是排擠忠良之臣，廢止公衆的議論，以賤凌貴，以邪干正的人呢？恰好僥幸小有成績的話，而興利之臣日見進用，崇尚道德的風氣却越來越薄，就尤其不是朝廷的福事了。”於是請求辭去言官。王安石本來與他關係很好，到這時雖然政見不和，還是敬重他的忠正信義，對他沒有深加怨怒，祇是讓他出京任提點京西刑獄。程顥堅決推辭，於是改爲簽書鎮寧軍判官。司馬光這時在長安，上疏請求隱退，他稱贊程顥梗直，以爲自己不如他。

程昉治理黃河，徵用了澶州士卒八百人，對他們進行虐待，衆人都逃了回來。澶州的官吏都畏懼程昉，想不接納。程顥說：“他們逃回來，如果不接納，一定會出亂子。要是程昉發怒的話，我一個人來擔當。”隨即親自去打開城門，對衆人進行安撫慰勞，跟大家約定，休息三天，再回去服役，衆人歡呼雀躍着進了城。程顥把事情的經過都上報，得以不被遣逐。後來程昉經過澶州，揚言說：“澶州士卒潰散，是程中允引誘的，我要上告皇帝。”程顥聽到後，說：“他現在正怕我，豈敢這樣做呢。”程昉果然沒上告。

曹村埽決，顥謂郡守劉涣曰：“曹村決，京師可虞。臣子之分，身可塞亦所當爲，盍盡遣廂卒見付。”涣以鎮印付顥，立走決所，激諭士卒。議者以爲勢不可塞，徒勞人爾。顥命善泅者度決口，引巨索濟衆，兩岸並進，數日而合。

求監洛河竹木務，歷年不叙伐閱，特遷太常丞。帝又欲使修《三經義》，執政不可，命知扶溝縣。廣濟、蔡河在縣境，瀕河惡子無生理，專脅取行舟財貨，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。顥捕得一人，使引其類，貰宿惡，分地處之，令以挽縛爲業，且察爲奸者，自是境無焚剽患。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，權焰震，諸邑競侈供張悅之，主吏來請，顥曰：“吾邑貧，安能效他邑。取於民，法所禁也，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。”除判武學，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，罷歸故官。又坐獄逸囚，責監汝州鹽稅。哲宗立，召爲宗正丞，未行而卒，年五十四。

顥資性過人，充養有道，和粹之氣，蓋於面背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，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。遇事優爲，雖當倉卒，不動聲色。自十五六時，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，遂厭科舉之習，慨然有求道之志。泛濫於諸家，出入於老、釋者幾十年，返求諸《六經》而後得之。秦、漢以來，未有臻斯理者。

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，誠意至於平天下，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，循循有序。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，卒

曹村的堤壩決口，程顥對太守劉涣說：“曹村決口，京城就令人擔憂。爲臣之職，即使用身體堵塞也是應當去做的，你何不把廂兵都交給我？”劉涣把鎮印給了程顥，程顥立即趕到決口的地方，激勵指揮士卒。有人說水流勢不可擋，要堵塞決口是白白耗費人力而已。程顥命令善於泅水的人渡過決口，拉上一條非常粗的繩索，讓其他人也渡過去，然後兩岸同時築堤，幾天的功夫就合攏了。

他請求監洛河竹木務，過了一年也沒有記功，特升爲太常丞。皇帝又想讓他纂修《三經義》，執政的人不答應，命令他出知扶溝縣。廣濟、蔡河兩條河流穿過縣境，沿河的無賴之徒沒有職業，專門截取行船的財貨，每年一定要燒掉十幾條船來逞威風。程顥命人將其中一人逮捕，讓他交待出同夥，赦免他們過去的罪惡，將他們安置在不同的地方，讓他們以拉縛爲業，同時監察做壞事的人，從此縣裏不再有焚燒剽掠的禍患。宦官王中正掌管按察保甲，權勢很大，各地都競相獻上奢靡的供奉以取悅於他，主人來到扶溝縣時，程顥說：“我們這個縣貧窮，豈敢和別的縣相比，從老百姓那裏抽取，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，我這裏祇有過去縣令的帷帳可以一用。”任武學判官，李定彈劾他在新法實行之初最先反對，罷歸故官。又因爲釋放囚犯之過，被責降監察汝州鹽稅。哲宗繼位，召爲宗正丞，未赴任而卒，時年五十四歲。

程顥天資過人，修養有道，面背之上，充盈着靜和純粹之氣，他的門人朋友跟他在一起幾十年，也沒見過他忿怒嚴厲的臉色。遇事從容不迫，即使在倉促之際，也不動聲色。從十五六歲開始，和弟弟程頤一同就學於汝南周敦頤，從此便厭倦科舉，心懷慷慨，立志求道。他遍讀諸子百家，在道家、佛學之間出入幾十年，最後返歸到《六經》之上而求得道。自從秦、漢以來，還沒有人像他所求得的理學。

他教導人從求知到知道行止，從修明誠意到治平天下，從日常的灑掃應對到窮理盡性，循循善誘。他不喜歡學習的人棄小不爲而好高騖遠，

無成焉，故其言曰：“道之不明，異端害之也。昔之害近而易知，今之害深而難辨。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，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。自謂之窮神知化，而不足以開物成務，言爲無不周遍，實則外於倫理，窮深極微，而不可以入堯、舜之道。天下之學，非淺陋固滯，則必入於此。自道之不明也，邪誕妖妄之說競起，塗生民之耳目，溺天下於污濁，雖高才明智，膠於見聞，醉生夢死，不自覺也。是皆正路之蓁蕪，聖門之蔽塞，辟之而後可以入道。”

顥之死，士大夫識與不識，莫不哀傷焉。文彥博采衆論，題其墓曰明道先生。其弟頤序之曰：“周公沒，聖人之道不行；孟軻死，聖人之學不傳。道不行，百世無善治；學不傳，千載無真儒。無善治，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，以淑諸人，以傳諸後；無真儒，則貿貿焉莫知所之，人欲肆而天理滅矣。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，以興起斯文爲己任，辨異端，闡邪說，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，蓋自孟子之後，一人而已。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，則孰知斯人之爲功；不知所至，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。”

嘉定十三年，賜謚曰純公。淳祐元年封河南伯，從祀孔子廟庭。

程頤

程頤字正叔。年十八，上書闕下，欲天子黜世俗之論，以王道爲心。游太學，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，頤因答曰：

學以至聖人之道也。聖人可學而至歟？曰：然。學之道如何？曰：天地儲精，得五行之秀

最終一無所成，所以他說：“道所以不明，是異端爲害的緣故。過去的害人之說淺近易知，而當今的害人之說却深澀難辨。過去異說迷惑人是乘人無知，現在異說迷惑人是因人高明。自認爲是窮盡神機通曉變化，都不能夠開創事業，說起來無所不包，實際上却悖於人倫常理，極盡深察細微，却不能夠進入堯、舜之道。天下之學，不是淺陋凝固，就一定是入於此途。自從道昏昧之後，荒誕怪異的邪說競相而起，斥充百姓的耳目，將天下之人陷於污濁之地，即使是具有高才明智的人，也因執於見聞，醉生夢死，而不自知。這都是正路上的荆棘雜草，堵塞了聖人之門，需要除掉纔可以入道。”

程顥去世，士大夫不論是認識或不認識的，無不感到悲傷。文彥博采納衆說，爲他的墓題名明道先生。他的弟弟程頤作序說：“周公死後，聖人之道就不行於世了；孟軻死後，聖人之學就沒有傳續了。道不行於世，所以百代也沒有一個好的政治；學不傳，所以千年也沒有一個真正的儒者。沒有好的政治，士人還可以明治政之道，而教人善，並且傳於後人；沒有真正的儒者，就昏昏然不知何去何從，從而人欲肆虐，天理滅絕。先生生當一千四百年後，從遺落的經典中得到前人失傳的經學，把復興遺文作爲自己的使命，辨別異端之見，排除奸邪之說，使聖人的道再度昌明於世間，在孟子死後，也就祇有這一個人而已。然而學者如果不知道道在何處，又有誰會知道這個人的功績；不知道道在，又有誰會知道稱他爲明道先生是名副其實的。”

嘉定十三年，賜謚號爲純公。淳祐元年追封爲河南伯，在孔子廟配祭。

程頤字正叔。十八歲時，他上書給皇帝，要求皇帝廢黜世俗的言論，將王道置於心間。他游歷太學時，看到胡瑗問學生顏子喜歡學習什麼的問題，於是程頤回答說：

學習以達到聖人之道。聖人可以學嗎？回答說：可以。學習之道怎樣？回答說：天地儲藏精華，得到五行精華的成爲人，

者爲人，其本也真而靜，其未發也，五性具焉，曰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形既生矣，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，其中動而七情出焉，曰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欲。情既熾而益蕩，其性鑿矣。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，正其心，養其性；愚者則不知制之，縱其情而至於邪僻，梏其性而亡之。

然學之道，必先明諸心，知所養，然後力行以求至，所謂“自明而誠”也。誠之之道，在乎信道篤，信道篤則行之果，行之果則守之固，仁義忠信不離乎心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，出處語默必於是，久而弗失，則居之安，動容周旋中禮，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。

故顏子所事，則曰：“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”仲尼稱之，則曰：“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”又曰：“不遷怒，不貳過。”“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。”此其好之篤，學之得其道也。然聖人則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；顏子則必思而後得，必勉而後中。其與聖人相去一息，所未至者守之也，非化之也。以其好學之心，假之以年，則不日而化矣。

後人不達，以謂聖本生知，非學可至，而爲學之道遂失。不求諸己，而求諸外，以博聞強記、巧文麗辭爲工，榮華其言，鮮有至於道者。則今之學，

其根本是真而靜，尚未成長的時候，五種品性都具備，即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形體既已產生，外界事物與人接觸因此本性就動搖了，本性一搖動七情就出現了，即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欲。七情越發熾烈蕩揚，人的本性就被破壞了。所以清醒的人要約束自己的情欲使其合乎中，端正本心，養護本性；而愚蠢的人則不知道制止，放縱情欲以至於邪惡乖僻，將自己的本性桎梏而盡。

那麼學問之道，一定要先明本心，懂得自己修養，然後身體力行以求達到，也就是所說的“從明而達到誠”。誠之道，在於篤信道，篤信道實行起來就果決，實行果決持守就長久，仁義忠信之道不離心，即使在倉促之際也保持此心，即使在困頓之時也保持此心，進退出處言談之間也以此自守，久而不失，那麼實行起來就會很安然，容貌舉動進退之間都合乎禮，那麼奸邪乖僻之心就無從產生了。

所以顏子的言行，則是：“不合乎禮的不看，不合乎禮的不聽，不合乎禮的不說，不合乎禮的不做。”仲尼稱贊他說：“得到一善便拳拳服膺不再失去。”又說他：“不遷怒於人，同一種錯誤不犯兩次。”“自己行爲中有不善的地方未曾不知道，知道了未曾再做。”這是好之深篤，學而得道的。然而聖人則是不用思求就能得到，不用自我努力就能合乎標準；而顏子則是一定要通過思求纔能得到，一定要經過努力纔能做得合乎標準。他與聖人祇差一息之間，未做到的祇是他用心持守，而不是感化所致。以他的好學精神，經過一段時日，很快就會達到教化的。

後人不明白，以爲聖人本是生而知之，不是學而知之，於是爲學之道便失去了。不返身自求，而求諸外物，致力於博聞強記、精文麗句，很少有得道的，今天的爲學，與顏子的所好不同了。

與顏子所好異矣。

瑗得其文，大驚異之，即延見，處以學職。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。

治平、元豐間，大臣屢薦，皆不起。哲宗初，司馬光、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：“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，力學好古，安貧守節，言必忠信，動遵禮法。年逾五十，不求仕進，真儒者之高蹈，聖世之逸民。望擢以不次，使士類有所矜式。”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，力辭。

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，既入見，擢崇政殿說書。即上疏言：“習與智長，化與心成。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，亦必延名德之士，使與之處，以熏陶成性。况陛下春秋之富，雖睿聖得於天資，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。大率一日之中，接賢士大夫之時多，親寺人宮女之時少，則氣質變化，自然而成。願選名儒入侍勸講，講罷留之分直，以備訪問，或有小失，隨事獻規，歲月積久，必能養成聖德。”頤每進講，色甚莊，繼以諷諫。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，問：“有是乎？”曰：“然，誠恐傷之爾。”頤曰：“推此心以及四海，帝王之要道也。”

神宗喪未除，冬至，百官表賀，頤言：“節序變遷，時思方切，乞改賀爲慰。”既除喪，有司請開樂置宴，頤又言：“除喪而用吉禮，尚當因事張樂，今特設宴，是喜之也。”皆從之。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，頤詣宰相問安否，且曰：“上不御殿，太后不當獨坐。且人主有疾，大臣可不知乎？”翌日，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。

胡瑗得到他的文章，感到非常驚異，立即請來相見，給他安排一個學職。呂希哲首先以老師之禮節侍奉程頤。

治平、元豐間，大臣屢次推薦程頤，他都不出來爲官。哲宗初年，司馬光、呂公著一同上疏稱揚他的躬行仁義：“河南府的處士程頤，致力於學喜好古道，安於清貧信守仁義，言必忠信，一舉一動都遵循禮法。年過五十，還不求仕進，真是儒者中的高行之士，聖世的逸民。希望能不論資歷將他擢升，使天下的士人有所取法。”皇帝下詔命他任西京國子監教授，他堅決推辭。

不久被召爲秘書省校書郎，進見之後，又擢升爲崇政殿說書。於是上疏道：“學習因智慧的增長，教化隨心靈的躍遷而形成。現在百姓善於教導子弟的，一定要延請有名望德行的士人，使自己的子弟與他們相處，以熏陶他們的品性。更何況陛下正當年富力強，雖然具有睿智聖明的天賦，但輔佐教育之道是不能不備的。大概一天當中，接觸賢人士大夫的時間多，親近宦官宮女的時間少，那麼氣質變化，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。希望選拔有名望的儒者進宮宣講，講完之後留下來值班，以備詢問，如果有小的過失，就隨時加以規勸。這樣時間一長，一定能够養成聖明的品德。”程頤每次進宮宣講，容貌都非常莊嚴，接着便向皇帝勸諫。他聽說皇帝在宮中盥洗的時候避開螞蟻，就問：“有這回事嗎？”皇帝說：“是的，我怕踩傷了螞蟻。”程頤說道：“將這種心懷推廣到四海，是帝王的要道。”

神宗的喪服還沒除掉，冬至這一天，百官進表道賀，程頤說：“時序變遷，此時的思情正深切，請求將賀改爲慰。”喪服除掉之後，有關部門請求作樂備宴，程頤又說：“除去喪服用吉禮，講究因事設樂，現在特地設宴，是表示喜悅。”結果都聽從了程頤。皇帝曾經因爲長瘡疹有幾天不到邇英殿，程頤到宰相那裏詢問皇帝的安康，并且說：“皇上不臨殿，太后不應當一個人坐朝。而且皇上有病，大臣可以不知道嗎？”第二天，宰相以下的官員開始向皇帝奏請問疾。

蘇軾不悅於頤，頤門人賈易、朱光庭不能平，合攻軾。胡宗愈、顧臨詆頤不宜用，孔文仲極論之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。久之，加直秘閣，再上表辭。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，去官。紹聖中，削籍竄涪州。李清臣尹洛，即日迫遣之，欲入別叔母亦不許，明日贐以銀百兩，頤不受。徽宗即位，徙峽州，俄復其官，又奪於崇寧。卒年七十五。

頤於書無所不讀，其學本於誠，以《大學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爲標指，而達于《六經》。動止語默，一以聖人爲師，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。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，便脫然欲學聖人，故卒得孔、孟不傳之學，以爲諸儒倡。其言之旨，若布帛菽粟然，知德者尤尊崇之。嘗言：“今農夫祁寒暑雨，深耕易耨，播種五穀，吾得而食之；百工技藝，作爲器物，吾得而用之；介胄之士，被堅執銳，以守土宇，吾得而安之。無功澤及人，而浪度歲月，晏然爲天地間一蠹，唯綴緝聖人遺書，庶幾有補爾。”於是著《易》、《春秋傳》以傳於世。《易傳序》曰：

《易》，變易也，隨時變易以從道也。其爲書也，廣大悉備，將以順性命之理，通幽明之故，盡事物之情，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。聖人之憂患後世，可謂至矣。去古雖遠，遺經尚存，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，後學誦言而忘味，自秦而下，蓋無傳矣。予生千載之後，悼斯文之湮晦，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，此《傳》所以作也。

蘇軾不喜歡程頤，程頤的門人賈易、朱光庭憤憤不平，一起抨擊蘇軾。胡宗愈、顧臨詆毀程頤不宜任用，孔文仲又極力申明此論，於是出朝爲管勾西京國子監。許久之後，加任直秘閣，程頤兩次上表辭謝。董敦逸又摘取他有怨恨之情的話，爲此而失官。紹聖年間，被削除名籍貶逐涪州。李清臣任洛陽尹，當天就遣送他，想要進門跟叔母道別都不允許，第二天拿一百兩銀子送給他，程頤不接受。徽宗繼位之後，遷徙到峽州，不久官復原職，崇寧中又被奪官。死時七十五歲。

程頤對書無所不讀，他的學說推本於誠，以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爲標杆，而旁通於《六經》。視聽言動，一概以聖人爲師，不達到聖人的標準不罷休。張載稱他們兄弟從十四五歲時，就超凡脫俗想要學成聖人，所以終究獲得已經失傳的孔、孟之道，首倡於群儒之間。他倆言論的旨意，就像布帛米粟一樣樸實，明白道德的人尤其加以尊崇。程頤曾經說：“農夫冒着嚴寒酷暑，精耕細作，播種五穀，我得以有糧可食；工匠們用他們的技藝，製作各種器物，我得以有器物可用；身披鎧甲的戰士，手握兵器，保衛國土，我得以獲得安寧。而我沒有功業恩澤惠及於人，在這裏虛度光陰，安然而居，祇是天地間的一隻蠹蟲，祇有編輯聖人留下的書籍，以有補於世。”於是寫成《易傳》、《春秋傳》而傳之於世。《易傳序》說：

《易》，就是變易，隨時變易以從道。作爲一部書，內容廣大萬事皆備，將要用來通性命之理，曉幽明之故，盡事物之情，展示開物成務之道。聖人對後世的憂患，可以說是深切到極至了。現在離古時雖已很遠，可是還存有往古的經典，可是前代的儒者搞錯了經典的旨意而在那裏加以傳揚，後來的學者祇是誦讀經典的言辭而忘記了其所蘊含的意義，從秦代以後，就沒有傳續。我生當千年之後，傷悼這典文的埋沒不明，將要使後人沿流討源，這是《易傳》寫作的原因。

“《易》有聖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辭，以動者尚其變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”。吉凶消長之理、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，推辭考卦可以知變，象與占在其中矣。“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”，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，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。至微者理也，至著者象也。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，觀會通以行其典禮，則辭無所不備。故善學者，求言必自近，易於近者，非知言者也。予所傳者辭也，由辭以得意，則在乎人焉。

《春秋傳序》曰：

天之生民，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，治之而爭奪息，導之而生養遂，教之而倫理明，然後人道立，天道成，地道平。二帝而上，聖賢世出，隨時有作，順乎風氣之宜，不先天以開人，各因時而立政。暨乎三王迭興，三重既備，子、丑、寅之建正，忠、質、文之更尚，人道備矣，天運周矣。聖王既不復作，有天下者雖欲仿古之迹，亦私意妄爲而已。事之繆，秦至以建亥爲正；道之悖，漢專以智力持世，豈復知先王之道也。

夫子當周之末，以聖人不復作也，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，於是作《春秋》，爲百王不易之大法。所謂“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”者也。先儒之傳，游、夏不能贊一

“《易》中的聖人之道有四方面：善於言論者崇尚其言辭，善於行動者崇尚其變，利用其製作器具的崇尚象，利用其進行占卜的崇尚占卜。”吉凶消長的道理、進退存亡之道都在書中具備，推究其言辭考察其卦就可以通曉變，象和占卜都在其中了。“君子居處時看其象而玩味其言辭，行動時觀察其變而玩味其占”，明白言辭而不能通曉蘊意是有的，但是沒有不明白言辭就能通曉蘊意的。最爲精微的是理，最爲顯著的是象。本體和功用同出一源，顯著與精微渾然無間，融會貫通來施行典制，那麼言辭中是無所不備的。所以善於學習的人，一定要從近處入手來求取言義，忽略了近處的，不是知言的人。我所傳續的是言辭，經由言辭而獲得蘊意，那就在於人了。

《春秋傳序》說：

上天創生萬民，一定會有出類拔萃的人才起來作萬民的君長，治理百姓從而爭強弱，引導他們而使他們得以生長養育，教導他們而使人倫常理明晰，然後人道立，天道成，地道平。在炎黃二帝之上，聖賢輩出，隨着時運各有作為，順適風習所向，不在天之前開啓衆人，都是因循時代的變遷而施行政道。等到三王相繼興起，三重已經具備，子、丑、寅的建立，忠誠、質樸、文華的崇尚代相更替，從此人道完備，天道周遍。聖王已經不再出現，持有天下的人即使想效法古人的治道，也祇是以一己之見妄爲而已。事情的荒謬，秦代竟然以建亥爲正；治道的悖亂，漢代專門用智力治世，豈能再懂得先王之道呢？

孔子生當周朝末年，因爲聖人不再出現，順應上天和時運的治政不再有，於是寫作《春秋》，成爲百代都不能更改的根本大法。即所說的“稽考三王時代沒有謬誤，加在天地之上也不違背，質正鬼神沒有疑問，流傳百代以等待聖人的出現而無疑惑”。先儒的書傳，子游、子夏這些人不能加一個

辭，辭不待贊者也，言不能與於斯爾。斯道也，唯顏子嘗聞之矣。“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輶，服周之冕，樂則《韶舞》”，此其準的也。後世以史視《春秋》，謂褒善貶惡而已，至於經世之大法，則不知也。

《春秋》大義數十，其義雖大，炳如日星，乃易見也。惟其微辭隱義、時措從宜者，爲難知也。或抑或縱，或予或奪，或進或退，或微或顯，而得乎義理之安，文質之中，寬猛之宜，是非之公，乃制事之權衡，揆道之模範也。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，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，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，非上智不能也。故學《春秋》者，必優游涵泳，默識心通，然後能造其微也。後王知《春秋》之義，則雖德非禹、湯，尚可以法三代之治。

自秦而下，其學不傳，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，故作《傳》以明之，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，得其意而法其用，則三代可復也。是《傳》也，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，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。

平生誨人不倦，故學者出其門最多，淵源所漸，皆爲名士。涪人程頤於北巖，世稱爲伊川先生。嘉定十三年，賜謚曰正公。淳祐元年，封伊陽伯，從祀孔子廟庭。

門人劉絢、李籲、謝良佐、游酢、張繹、蘇曄皆班班可書，附于左。呂大鈞、大臨見《大防傳》。

字，言辭不待加，是說不能參與其中。這個道，祇有顏子曾經聞聽。“行夏代之時，坐殷代之車，服用周代之冕，欣賞樂舞就選擇《韶舞》”，這是其標準。後世的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《春秋》，說是揚善斥惡而已，而對於其治世的根本大法，却不知道。

《春秋》中所包含的重要義理有幾十方面，其義理雖然很廣大，却如日星在天，輝煌耀眼，因而容易看到。祇是微言隱義，那些隨時的言論，難於明白。有的抑，有的縱，有的取，有的捨，有的進有的退，有的隱有的顯，全都合乎義理，文華和質樸兼具，寬和與嚴格相宜，在是非問題上很公正，是制定事物的標準，度量道理的典範。觀察百物之後纔知道造化的神奇，含納了衆多的材料然後知道建造房室的作用，通過一事一義來窺探聖人的用心，沒有大智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學習《春秋》的人，一定要慢慢地涵味默默地記守，心領神會，然後纔能達到精微的境界。後來的君王如果明白《春秋》的義理，那麼雖然德行比不上禹、湯，還可以效法三代的政治。

自從秦代以後，《春秋》之學沒有傳續，我爲聖人的心志不被後世知道而哀傷，所以作《春秋傳》來加以宣明，使後來的人通曉其文來求其義，明白其含義來效法運用，那麼三代的政治就可以恢復了。所以這部《春秋傳》，雖然還不能極盡聖人的深奧含義，却可使學習的人找到入門之路。

他一生誨人不倦，所以門下的弟子最多，受其淵源影響，這些人都成了有名之士。涪州人在北巖爲程頤修建了祠廟，世人稱他爲伊川先生。嘉定十三年，賜謚號正公。淳祐元年，受封爲伊陽伯，在孔子廟陪祭。

他的門人劉絢、李籲、謝良佐、游酢、張繹、蘇曄都有許多事迹，值得一書，今附於下卷。呂大鈞、呂大臨的事迹見本書《呂大防傳》。

張載

張載字子厚，長安人。少喜談兵，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。年二十一，以書謁范仲淹，一見知其遠器，乃警之曰：“儒者自有名教可樂，何事於兵。”因勸讀《中庸》。載讀其書，猶以爲未足，又訪諸釋、老，累年究極其說，知無所得，反而求之《六經》。嘗坐虎皮講《易》京師，聽從者甚衆。一夕，二程至，與論《易》，次日語人曰：“比見二程，深明《易》道，吾所弗及，汝輩可師之。”撤坐輟講。與二程語道學之要，渙然自信曰：“吾道自足，何事旁求。”於是盡棄異學，淳如也。

舉進士，爲祁州司法參軍，雲巖縣令。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，每月吉，具酒食，召鄉人高年會縣庭，親爲勸酬，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，因問民疾苦，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。

熙寧初，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，神宗方一新百度，思得才哲士謀之，召見問治道，對曰：“爲政不法三代者，終苟道也。”帝悅，以爲崇文院校書。他日見王安石，安石問以新政，載曰：“公與人爲善，則人以善歸公；如教玉人琢玉，則宜有不受命者矣。”明州苗振獄起，往治之，末殺其罪。

還朝，即移疾屏居南山下，終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簡編，俯而讀，仰而思，有得則識之，或中夜起坐，取燭以書。其志道精思，未始須臾忘，亦未嘗須臾忘也。敝衣蔬食，與諸生講

張載字子厚，長安人。年少時喜好談論軍事，以至於想糾集人去奪取洮西之地。二十一歲那年，他投書拜謁范仲淹，范仲淹一見，便知道他是個能成大器的人，於是就告誡他說：“儒者自有名教作爲樂事，不必談論軍事。”於是勸他讀《中庸》。張載讀了《中庸》，感到還不滿足，又訪求佛、道二家之書，用一年的時間深研其學說，知道不會有收穫，就返歸而研求《六經》。他曾經在京城坐在虎皮上講《易》，聽講的人很多。有一天晚上，二程來了，他們跟張載談論《易》，第二天張載告訴衆人說：“我見了二程，看他們都深明《易》道，我比不上，你們可以去拜他們爲師。”於是撤座罷講。他跟二程談論道學的要領之後，精神煥發，充滿了自信，說道：“我的道很充足，爲何要向別處尋求呢？”從此他全部拋棄異端之學，十分純粹。

張載考中進士後，作了祁州司法參軍，雲巖縣令。治理政事把敦促百姓務本、引導民俗向善放在首位，每月初一，都讓人備好酒菜，召集鄉里年紀大的人到縣上一聚，親自勸酒讓菜，意在使百姓懂得敬養老人、尊奉長輩的道理，并以此詢問百姓疾苦，教給他們訓導子弟的方法。

熙寧初年，御史中丞呂公著進言張載具備古人之學，這時神宗正在改革，盼望着得到睿智的才士來謀劃諸事，於是召見了張載，向他詢問治國之道。張載回答說：“治理政事如果不效法三代的話，終究是苟且之道。”神宗很高興，讓他作崇文院校書。有一天見到王安石，王安石問他新政怎麼樣，他說：“你如果與人爲善，那麼別人也會用善來回報；如果政令如同玉工雕琢玉一般繁，那麼不接受命令是很正當的。”明州苗振冤獄興起，張載去那裏處理，最後免掉了當事人的罪行。

還歸朝廷，隨即便稱病而隱居於南山之下，整天在房中正襟危坐，左右都是書籍，俯身閱讀，仰面而思，有心得就記下來，有時候半夜坐起來，點上蠟燭書寫。探求道學，一刻也未曾停止，一刻也未曾忘記。穿着破舊的衣服吃着粗劣

學，每告以知禮成性、變化氣質之道，學必如聖人而後已。以爲知人而不知天，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，此秦、漢以來學者大蔽也。故其學尊禮貴德、樂天安命，以《易》爲宗，以《中庸》爲體，以《孔》、《孟》爲法，黜怪妄，辨鬼神。其家昏喪葬祭，率用先王之意，而傳以今禮。又論定井田、宅里、發斂、學校之法，皆欲條理成書，使可舉而措諸事業。

呂大防薦之曰：“載之始終，善發明聖人之遺旨，其論政治略可復古。宜還其舊職，以備諮詢。”乃詔知太常禮院。與有司議禮不合，復以疾歸，中道疾甚，沐浴更衣而寢，旦而卒。貧無以斂，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。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，乞加贈恤，詔賜館職半赙。

載學古力行，爲關中士人宗師，世稱爲橫渠先生。著書號《正蒙》，又作《西銘》曰：

乾稱父而坤母，予茲藐焉，乃混然中處。故天地之塞吾其體，天地之帥吾其性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。

大君者，吾父母宗子；其大臣，宗子之家相也。尊高年所以長其長，慈孤幼所以幼其幼，聖其合德，賢其秀也。凡天下疲癃殘疾、惄獨鰥寡，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。“于時保之”，子之翼也。“樂且不憂”，純乎孝者也。違曰悖德，害仁曰賊，濟惡者不才，其踐形惟肖者也。

知化則善述其事，窮神則善繼其志，不愧屋漏爲無忝，存心養性爲匪懈。惡旨酒，崇伯子之

的飯菜，和諸位弟子一起講學論道，常常告訴給他們遵循禮以養成道德、改變氣質的道理，告訴給他們學習一定要達到聖人的標準纔可以中止。認爲祇知道人而不知道天，祇求做賢人而不求做聖人，這是秦、漢以來學者的一大弊病。所以他爲學尊重禮義崇尚道德，樂於天命，以《易》爲宗極，以《中庸》爲體，以孔、孟爲法，罷黜怪異荒誕，分辨鬼神之論。他家中的婚喪祭祀，一概沿用先王的規範，同時輔以當代的禮節。他還論定井田、宅里、散斂、學校的法規，都想整理成冊，以便運用到各項事業之中。

呂大防推薦他說：“張載自始至終，都善於宣明聖人的旨意，他的政論大略可以復古。應該讓他官復原職，以備詢問。”於是皇帝下詔授知太常禮院。跟有關官員論禮意見不合，於是又因病而歸，半路上病情加重，沐浴更衣而卧，第二天早晨去世。家貧無法入殮，他的弟子共同買好棺材將他送回家鄉。翰林學士許將等人進言說張載不求仕途，請求給予封贈和撫恤，皇帝下詔賜與館職和一半助喪費。

張載學習古道並且身體力行，是關中士人的宗師，世人稱他爲橫渠先生。他的書名爲《正蒙》，又寫了《西銘》說道：

乾稱爲父而坤稱爲母，我很弱小，於是處於其中。所以天地充塞我的身體，天地統領我的本性，百姓都是我的同胞，萬物都是我的朋友。

君主，是我父母的嫡長子；大臣，是嫡長子的家臣。尊重年紀大的人來敬侍長輩，對孤寡幼小的人慈愛，聖人是與天地合德的人，賢士是傑出的人。凡是天下的疲弱殘疾、鰥寡孤寡者，都是我兄弟之中困苦無依的人。“這個時候去保護他們”，是你的庇祐。“永遠快樂而不憂愁”，是有純真孝心的人。違背就叫有悖於德，害仁叫做賊，助惡的人沒有德，有天賦品質的人類似於聖人。

通曉造化就善於行事，窮竭神思就善於承述志意，即使房屋漏雨也無所羞愧，保全本心、涵養性情不懈怠。厭惡美酒，是崇伯

顧養；育英材，穎封人之錫類。不弛勞而底豫，舜其功也；無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。體其受而歸全者，參乎；勇於從而順令者，伯奇也。富貴福澤，將厚吾之生也；貧賤憂戚，庸玉女於成也。存，吾順事；歿，吾寧也。

程頤嘗言：“《西銘》明理一而分殊，擴前聖所未發，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，自孟子後蓋未之見。”學者至今尊其書。

嘉定十三年，賜謚曰明公。淳祐元年封郿伯，從祀孔子廟庭。弟翫。

張翫

翫，字天祺。起進士，調閩鄉主簿，知金堂縣。誠心愛人，養老恤窮，間召父老使教督子弟。民有小善，皆籍記之。以奉錢爲酒食，月吉，召老者飲勞，使其子孫侍，勸以孝弟。民化其德，所至獄訟日少。

熙寧初，爲監察御史裏行。累章論王安石亂法，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。劾曾公亮、陳升之、趙抃依違不能救正，韓絳左右徇從，與爲死黨，李定以邪諂竊臺諫。且安石擅國，輔以絳之詭隨，臺臣又用定輩，繼續而來，芽蘖漸盛。呂惠卿刻薄辯給，假經術以文奸言，豈宜勸講君側。書數十上，又諳中書爭之，安石舉扇掩面而笑，翫曰：“翫之狂直宜爲公笑，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。”趙抃從旁解之，翫曰：“公亦不得爲無罪。”抃有愧色。遂稱病待罪。

出知公安縣，徙監司竹監，至舉家不食筍。常愛用一卒，及將代，自見其人盜筍籜，治之無少貸；罪已

之子的奉養；培育英才，是穎封之人的賜與同類。終日勞作而終究安樂，是舜的功勞；無處可逃而等待烹煮，是申生的恭謹。通過接受而達到全面的，該是曾參；勇於遵從而順從命令的，是伯奇。富貴福祉，將厚養我的生命；貧賤憂愁，將造就你成功。活着，我順事；死了，我安寧。

程頤曾經說：“《西銘》說明理是歸而分的道理，發前人所未發，與孟子的性善論養氣說有同等功績，從孟子以後沒有見過。”學者至今還尊崇其書。

嘉定十三年，賜謚號爲明公。淳祐元年封爲郿伯，在孔子廟接受配祭。弟弟張翫。

張翫，字天祺。考中進士後，調任閩鄉主簿，金堂縣知縣。誠心愛人，贍養老者撫恤貧困，時而召集鄉中父老讓他們教育督導自己的子弟。百姓小有善行，都要記下來。用自己的俸錢置備酒菜，每月的月初，召集慰勞年紀大的人，給他們飲酒，同時讓他們的子孫在一旁侍奉，以勸勉孝悌之道。百姓爲他的德行所感化，他所到的地方訴訟案件日漸減少。

熙寧初年，任監察御史裏行。接連上書，論說王安石變亂法度，請求罷免條例司，追還常平使臣。又彈劾曾公亮、陳升之、趙抃模棱兩可，不能糾正時事，韓絳左右曲從，與王安石結爲死黨，李定以奸邪諂媚而竊居臺諫之位。王安石獨掌國政，加上韓絳的曲從左右，臺諫大臣又是李定之輩，他們陸續加入，勢力日盛。呂惠卿爲人刻薄，能言善辯，假藉經學之術來文飾奸邪之言，不適合在皇帝身邊講論。上書幾十次，又到中書省去爭辯，王安石用扇子遮面而笑，張翫說道：“我的狂妄直率應該被你耻笑，可是天下之人耻笑你的也不少。”趙抃從一旁勸解，張翫說：“你也不是沒有罪過。”趙抃面有愧色。於是張翫稱病不出而待罪。

被遣出知公安縣，轉監司竹監，以至於全家都不吃竹筍。他常喜歡使用一個役卒，等到要改換的時候，發現他偷盜筍殼，對他治罪，一點也

正，待之復如初，略不介意，其德量如此。卒于官，年四十七。

邵雍

邵雍字堯夫。其先范陽人，父古徙衡漳，又徙共城。雍年三十，游河南，葬其親伊水上，遂爲河南人。

雍少時，自雄其才，慷慨欲樹功名。於書無所不讀，始爲學，即堅苦刻厲，寒不爐，暑不扇，夜不就席者數年。已而嘆曰：“昔人尚友於古，而吾獨未及四方。”於是逾河、汾，涉淮、漢，周流齊、魯、宋、鄭之墟，久之，幡然來歸，曰：“道在是矣。”遂不復出。

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，聞雍好學，嘗造其廬，謂曰：“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？”雍對曰：“幸受教。”乃事之才，受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、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。之才之傳，遠有端緒，而雍探赜索隱，妙悟神契，洞徹蘊奧，汪洋浩博，多其所自得者。及其學益老，德益邵，玩心高明，以觀夫天地之運化，陰陽之消長，遠而古今世變，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，深造曲暢，庶幾所謂不惑，而非依仿象類、億則屢中者。遂衍宓羲先天之旨，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，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。

初至洛，蓬蓽環堵，不芘風雨，躬樵爨以事父母，雖平居屢空，而怡然有所甚樂，人莫能窺也。及執親喪，哀毀盡禮。富弼、司馬光、呂公著等諸賢退居洛中，雅敬雍，恒相從游，爲市園宅。雍歲時耕稼，僅給衣食。名其居曰“安樂窩”，因自號安

不寬容。過失得到糾正後，便又一如原來那樣對待他，一點都不介意，他的品德涵養就是這樣。最後死在任上，終年四十七歲。

邵雍字堯夫。祖先是范陽人，從父親邵古開始移家衡漳，後又移到共城。邵雍三十歲那年，到河南游歷，將他的雙親也埋葬在伊水旁，於是成爲河南人。

邵雍年少時，對自己的才能頗爲自負，志意慷慨想要立功名。讀書無所不及，初治學時，就刻苦磨礪，冬天不用爐火，夏天不用扇子，夜裏不上床就寢達幾年之久。之後感嘆道：“過去的人還與古人交友，而我却還沒有周游四方。”於是渡過黃河、汾河，越過淮水、漢水，周游在齊、魯、宋、鄭等古國的廢墟之上，很久以後，駕車歸來，說道：“道已經在我這裏了。”於是不再出門。

北海李之才代任共城縣令，聽說邵雍很好學，曾經到他的住處造訪，對他說：“你也聽說過關於物理、性命的學問嗎？”邵雍回答說：“希望聽到你的教誨。”於是師事之才，接受了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、宓羲所畫的八卦六十四卦圖。之才的傳學，淵源深遠，而邵雍探求那精微隱奧的道理，妙悟於心神會其意，洞察深奧的含義，浩瀚汪洋，極爲博大，多出自自己的心得。他的學問越成熟，品德越高尚，游心在高遠清明的境界，來觀察天地的變遷，陰陽的消長，遠至古今世事的變化，小至飛禽走獸乃至一草一木的性情，無不深究察辨，暢意通幽，使其沒有困惑，而不是模仿物象、猜測屢中者，於是推演宓羲先天的旨意，著書十多萬言傳行於世，但世人知道他的道的很少。

剛到洛陽的時候，住處的牆用蓬蒿荆條編成，不能遮風擋雨，他親自砍柴燒飯來侍奉父母，雖然平日經常斷炊，他却顯得異常快樂，旁人不能窺得其意。等到他執辦雙親喪禮的時候，哀傷毀體足行禮道。富弼、司馬光、呂公著等諸位賢者退居洛陽時，敬重邵雍，經常與他交游，爲他買下田宅。邵雍常到田間耕作，收成僅僅能

樂先生。旦則焚香燕坐，晡時酌酒三四甌，微醺即止，常不及醉也，興至輒哦詩自詠。春秋時出游城中，風雨常不出，出則乘小車，一人挽之，惟意所適。士大夫家識其車音，爭相迎候，童孺廝隸皆歡相謂曰：“吾家先生至也。”不復稱其姓字。或留信宿乃去。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，以候其至，名曰“行窩”。

司馬光兄事雍，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，父子昆弟每相飭曰：“毋爲不善，恐司馬端明、邵先生知。”士之道洛者，有不之公府，必之雍。雍德氣粹然，望之知其賢，然不事表襮，不設防畛，群居燕笑終日，不爲甚異。與人言，樂道其善而隱其惡。有就問學則答之，未嘗強以語人。人無貴賤少長，一接以誠，故賢者悅其德，不賢者服其化。一時洛中人才特盛，而忠厚之風聞天下。

熙寧行新法，吏牽迫不可爲，或投劾去。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，皆貽書訪雍，雍曰：“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，新法固嚴，能寬一分，則民受一分賜矣。投劾何益耶？”

嘉祐詔求遺逸，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，授將作監主簿，復舉逸士，補潁州團練推官，皆固辭乃受命，竟稱疾不之官。熙寧十年，卒，年六十七，贈秘書省著作郎。元祐中賜謚康節。

雍高明英邁，迥出千古，而坦蕩渾厚，不見圭角，是以清而不激，和而不流，人與交久，益尊信之。河南

够滿足衣食之需。他把自己的居所命名爲“安樂窩”，於是自號安樂先生。早晨他焚香安坐，晚間喝三四杯酒，微醉即止，經常不能喝醉，興致上來就吟詩自詠。春秋時節進城出游，遇上風雨天常常不出門，出游時他乘坐小車，由一人拉行，想到哪裏就到哪裏。士大夫家知道他車行的聲音，都爭相迎候，兒童僕役都歡呼着相告：“我們家先生到了。”不再稱他的姓名。有時他連宿兩夜方離去。好事的人模仿邵雍的住房另外爲他建造了一間房子，等候他的到來，稱它爲“行窩”。

司馬光像兄長一樣對待邵雍，兩人純正的品德格外爲鄉里人欽慕，父子兄弟之間常相申飭：“不要做不善之事，怕的是司馬端明、邵先生會知道。”士人路經洛陽，有的不到公府去，却一定要到邵雍的住所。邵雍德氣純粹，一看就知道是個賢人，然而他不求表露，也不與人設防，整天與衆人言笑相處，也不見什麼太大的不同。與人講話，樂於稱揚他好的地方而隱去他不好的地方。有過來向他問學的就爲之解答，未曾強迫他人聽他的。無論是貴賤長少，一律都對他們以誠相待，所以賢良的人欽慕他的品德，不賢良的人佩服他的道德，一時間洛陽的人才非常多，而此地的忠厚風尚名揚天下。

熙寧期間推行新法，牽強不便施行，有的官吏就上交了辭呈而離去。邵雍在州縣的門生舊友，紛紛致書詢問邵雍，邵雍說：“這正是賢人應當盡力的時候，新法固然嚴酷，但是如果能够寬緩一分，那麼百姓就受益一分。上書求去有什麼用呢？”

嘉祐中下詔訪求隱逸，留守王拱辰以邵雍應詔，授官將作監主簿，又被推舉爲隱逸之士，補爲潁州團練推官，邵雍都是在堅決推辭之後纔接受任命，最後還是稱病不赴任。熙寧十年去世，終年六十七歲，追贈秘書省著作郎。元祐年間賜謚號康節。

邵雍高風亮節，英發超邁，出千古之上，可又坦蕩渾厚，不見棱角，所以他清澈而不激越，和順而不流俗，旁人與他交往時間長了，就會越

程顥初侍其父識雍，論議終日，退而嘆曰：“堯夫，內聖外王之學也。”

雍知慮絕人，遇事能前知。程顥嘗曰：“其心虛明，自能知之。”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，務高雍所爲，至謂雍有玩世之意；又因雍之前知，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，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。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，皆以雍言先之，雍蓋未必然也。

雍疾病，司馬光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顥晨夕候之，將終，共議喪葬事外庭，雍皆能聞衆人所言，召子伯溫謂曰：“諸君欲葬我近城地，當從先塋爾。”既葬，顥爲銘墓，稱雍之道純一不雜，就其所至，可謂安且成矣。所著書曰《皇極經世》、《觀物內外篇》、《漁樵問對》，詩曰《伊川擊壤集》。

子伯溫，別有傳。

發尊重信任他。河南的程顥剛開始是侍奉他的父親而結識了邵雍，與他談論了一整天，回去之後感嘆道：“堯夫，體察的是內聖外王的學問。”

邵雍思慮超人，事情發生之前能够預知。程顥曾經說：“他心明眼亮，自然能够知道。”當時的學者因爲邵雍超人的見識，一定要拔高他的作爲，以致說邵雍有玩世不恭的意思；又因爲他能預知世事，說他對於事物的聲音形色的感知，都能由其動而推測其變。於是又拾取已經發生的事情，都拿邵雍的話來作爲預言，邵雍未必是如此。

邵雍生病期間，司馬光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顥早晚在床前侍候，在他臨終時，他們一同到外間商議喪葬之事，邵雍都能聽到衆人所說的話，於是把他兒子伯溫叫來說：“諸君想要把我埋在城區附近，應當隨葬先人的塋墓。”下葬之後，程顥爲他題寫墓志銘，稱頌邵雍的道純一不雜，其所達到的境界而言，可以說是安成了。它所著的書叫《皇極經世》、《觀物內外篇》、《漁樵問對》，詩集爲《伊川擊壤集》。

他的兒子伯溫，本書另外有傳。